
论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的相互关联性

国分良成

〈KOKUBUN Ryosei, 庆应义塾大学〉

中国已经建立了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核心的新领导体制。当然“领导体制”也是要加上引号的。因为去年（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尽管成立了以他们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但主要部门的最高职位仍然被江泽民的亲信掌控着。今年（2003年）春天围绕非典问题胡锦涛和江泽民的权力斗争愈发明显，得到老百姓支持的胡锦涛等人似乎取得了优势。但是结果不会这样简单，这场权力斗争的胜败仍然无法确定。

随着党、国家和政府制度化的进展，出现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一呼百应”现象的可能性正逐渐变小。不管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没有压倒性的偶像效应。但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更大的区别是，如何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正是因为社会正在变得如此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同时与此相关联的，领导者如何得到世界的认可和理解这一点也变得愈发重要。胡锦涛将防治非典的工作交由世界卫生组织监督，并最大限度地重视埃维昂八国首脑峰会出席的机会，这些举措可能正是出于上述的背景。

如果考虑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面提到的特点就更加明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目标就是维持国家体制，换句话说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就是说政治作为最终目标存在着。因此，维护权力所必需的东西、也就是权力的正当性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经济增长。目睹苏联崩溃的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了南巡讲话，明确指出扩大生产力是政权安定的最大条件。江泽民政权和胡锦涛政权在这一点上也不存在异议。

但是为了扩大生产力需要什么？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就是（海外的）直接投资。如果我们观察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海外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就会明确这一点。现在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论证了中国经济中外资的重要性。

今天，中国通过增加出口获得外汇，并以此进一步扩大国内投资。最近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动向也与此有关。但是中国出口的52%（2002年）来自外资企业，结果形成了海外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并销售到日本等海外（市场）的局面。另外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28%来自于外资企业，国家全部税收的约17%是外国企业缴纳的法人税（2002年）。

从这些数字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外资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重要的是，这些海外直接投资作为外在压力促进了中国国内从国有企业改革开始的经济改革。就是说中国（发展）的实质并不是“改革·开放”，而是“开放·改革”。中国在明知对国内经济的打击的情况下仍然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这种现实也必然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必须推

进国内的市场化进程，如果顺利的经济增长（对政权）仍然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就不可能对抗世界体系和国际规则。因此中国就必须坚持遵守国际体系（的规则），并基本上努力去维持它。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国际关系就必须进行真正的“全方位”开放，继续采取合作的姿态。这个意义上现在的中国与其说是试图变革现存世界体系的力量，不如说更是维持现状的势力。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是极其稳妥和灵活的。在伊拉克战争和朝鲜问题上对美国的言行的反应极为谨慎，对日关系上注意避免在历史问题上的过激言论，灵活慎重。同时中国表示出对中日韩三国协商机制的兴趣，通过自由贸易区（FTA）谈判与东盟各国积极推进市场开放，在台湾问题上也尽可能采取低姿态，可以说全方位外交硕果累累，全面开花。当然这里面也包含政治和安全的要素，但是笔者认为从中国国内的情况看，如何维持最重要的经济的安定增长还是一个（最）主要的要素。

至此可以看出，比起经济和外交上积极开放的改革政策，很明显政治上的改革却举步维艰，难有进展。尽管随着领导层的换代，（领导人的）为政风格上出现了若干变化，但时，特别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看不到真正想要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迹象。

为什么政治改革重要呢？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如何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资源进行分配。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是政治腐败的根源。在现有体制下，以被允许入党的私营企业家为开端的社会精英们逐渐成为共产党领导体制的既得利益阶层，而本来应由共产党代表其利益的工人农民的呼声和利益却在政治上越来越难以得到反映了。

弱势群体的立场如何在政治上得到反映，如何形成也有利于他们的财富的分配机制，这些是党和国家的任务。在只存在一个执政党的中国，如何公正地分配多样化的利益和计算得失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中国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刘星 译）